

# 兼容并包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关键性因素

## ——战国秦汉之际中国历史走势的启示

石 硕<sup>①</sup>

**摘 要：**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十字路口。后来的历史走向证明，结束诸侯长期征战的出路在于统一局面的出现，并给中国带来向前发展的巨大历史机遇。在战国向秦汉统一局面的转折中，承担了重大使命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正是“战国七雄”中的秦、楚两国。与“七雄”中其他五国相比较，秦、楚的共同特点是地处边僻，并大量吸纳戎狄、蛮夷成份，这使他们的“华夏”身份较模糊和边缘化，但唯其如此，赋予他们开创“新传统”的可能性与力量。战国秦汉之际中国历史走势充分印证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即对“西戎”“蛮夷”等新的相对于“华夏”的异质性因素的吸纳与兼容并包。这一进程不但拓展了“华夏”内涵与地域，也成为决定中国历史走势的关键性因素。

**关键词：**战国秦汉；秦；楚；西戎；蛮夷；兼容并包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23)06-0055-07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十字路口。无论“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均是在诸侯国激烈征战、角逐与兼并中脱颖而出。频繁而长期的战乱，导致原有政治秩序逐步瓦解，即孔子所言“礼崩乐坏”。新秩序与未来方向在何方？尚不得而知。对前途的不确定性和迷惘，使诸子纷纷从人性、事理、社会秩序等角度进行探讨，开出济世良方、形成百家争鸣。于是，在乱世的迷茫中，反促成了思想的繁荣与发展。

通常而言，历史事实恒常不变。但在恒常不变的历史事实中，人们能看到什么？却随时世和思想观念而异。

几年前，听一位秦汉史大家的讲座，谈秦何以能统一六国，具体内容记不太清了，大体是说，秦统一六国的原因，在于其技术上的先进性，并详尽列举了秦在各种技术上的领先性。但由此也让笔者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在战国到秦汉，即由分裂走向统一这一关键历史时期，是什么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

梁启超写过一篇谈战国赵武灵王的文章，题目叫《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读后暗自惊讶，梁启超为何对赵武灵王有如此之高的评价？当时并不是很理解。后来才慢慢体会到，赵武灵王主动效仿北狄之胡服骑射，虽属突兀，是对异质性“他山之石”的借鉴，却给当时自称“中国”并讲求冠戴礼仪的“华夏”带来一缕新风。<sup>①</sup>

战国七雄中，最接近于夷狄者，无疑要算赵、秦、楚三国。燕本来也与北方夷狄接壤，但地

<sup>①</sup>作者简介：石硕，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 成都，610064）。

<sup>②</sup>台湾学者柏杨在《白话译本资治通鉴》中也称赞赵武灵王“是一个传奇人物，从他坚持变更服装、更新装备一事，可看出他观察力之强和意志之坚。赵国疆土，在他的手中倍增，战斗力也倍增。如果他能再活二十年，秦国可能受到严重威胁，历史又如何发展，难以预料。”柏杨《白话译本资治通鉴》第1册《战国时代》，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第222~223页。

处僻远且在七雄中并不发达，故影响力尚无足轻重。赵国的疆域大致在今山西、河北一带，不仅直接与北狄相接，且与北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史记·赵世家》记“赵氏之先，与秦共祖”<sup>①</sup>而秦之先世“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sup>②</sup>可见，赵同样与夷狄关系密切。这大约正是效仿夷狄胡服骑射，即“以夷之长技制夷”最早出现于赵的原因。不过，有三个原因导致赵国并未在后来的历史巨变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是赵离强大的秦太近，没有坐大的机会；二是赵的疆域缺乏天然屏障，无险可据；三是赵武灵王凭敏锐直觉和灵感意识到须学习和效法夷狄胡服骑射的逆袭和反传统之举受到较大非议和阻力，并未能够延续下去。

因此，在战国七雄中，得以充分吸纳夷狄因素的主要是秦、楚两国。

在战国到秦汉的历史演变中，秦、楚有两个突出共同点：

其一，二者均在历史巨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秦统一六国，其作用自不待言。但在推翻秦之暴政、开创汉朝盛世的历史转折中，楚同样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完全应验了“亡秦必楚”这句话。

其二，在春秋战国各诸侯国眼中，秦、楚均非当时“华夏”之正宗。他们或大量杂糅戎狄成分，或直接被视为“蛮夷”。尽管秦、楚均因实力而跻身“七雄”，但二者在文化上的异质性显而易见。从“华夏”的视角看，二者皆处于不太纯粹和较边缘的位置。

## 二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秦、楚两国在战国到秦汉的历史转折中所以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并扮演重要角色，同他们非“华夏”正宗和文化上的不纯粹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相关性？此问题甚为关键，直接关涉我们对促成战国至秦汉这一历史转折决定性因素的认识与理解。

《史记·秦本纪》记秦“在西戎，保西垂”<sup>③</sup>秦之先世“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sup>④</sup>可见，秦的祖先游离于“华夏”与“夷狄”之间，身份较为模糊。在秦的崛起中，其兼容并包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

一、秦穆公时“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sup>⑤</sup>这使秦的疆域大幅度向西拓展，并与西戎发生密切联系和交融，秦军中不断吸纳戎人成分，开始跻身强国之列。

二、秦惠文王时用张仪之谋，派司马错率军灭巴蜀。今天我们已习惯于将巴蜀归入“华夏”序列。但在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之时，蜀地的文化对于秦的异质性相当明显。司马错曰“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sup>⑥</sup>张仪亦云“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伦也。”<sup>⑦</sup>“戎翟之伦”一语，清楚表明蜀人与秦在文化完全不同。蜀人在人群系统上属于“南夷”<sup>⑧</sup>与秦人言语不通，文化相异。这导致灭蜀以后，蜀人对秦的反抗相当剧烈。在灭蜀后近30年中，蜀地的政局一直动荡不稳，反叛不断。<sup>⑨</sup>为有效防御蜀地的反叛，秦采取了大规模移民的对策，以“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sup>⑩</sup>由此开启了秦向蜀地移民的传统。《史记》曰“秦之迁人皆居

①《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79页。

②《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4页。

③《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4页。

④《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4页。

⑤《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页。

⑥《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83页。

⑦《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82页。

⑧《汉书·地理志》：“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5页。

⑨蒙文通认为“从秦灭蜀后三十年，到诛蜀侯馆才算定蜀。”参见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9年第5期。引自《蒙文通文集》第2卷《古族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222页。

⑩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8页。《太平寰宇记》卷七十四《剑南西道三》亦记“昔秦惠王伐蜀，移秦人万家以实蜀中”。参见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1511页。

蜀。”<sup>①</sup> 移民成为秦消解蜀之异质性的主要手段。经过近百年的治理以及移民与蜀人的融合，到李冰任蜀守时（公元前256年至公元前251年），“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sup>②</sup> 唐人卢求亦称“置巴蜀郡，迁秦人万家实之，民始能秦言”。<sup>③</sup> 从蜀人被称作“戎翟之长”“戎伯”且与秦人言语不通看，对秦而言，蜀人的异质性乃显而易见。

灭巴蜀对于秦统一六国至少有以下重大意义：其一，巴蜀尤其是蜀地的富庶和辽阔地域增加了秦统一六国的实力与筹码。正如《史记·张仪列传》记“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sup>④</sup> 蜀的富庶很大程度奠定了秦统一六国的经济基础，使与六国竞争之天平进一步向秦倾斜。其二，为秦灭楚提供了地理、军事与经济优势。楚在六国中武力强大、地域辽阔，是秦统一的主要障碍。但楚与巴蜀相接，灭巴蜀后，秦获得了由巴蜀攻楚之地理优势。公元308年，秦遣“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sup>⑤</sup> 公元前280年，秦遣“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sup>⑥</sup> 公元前277年，秦派“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sup>⑦</sup> 对秦取巴蜀后所获得的对楚之优势，宋人郭允蹈在《蜀鉴》中有一段精辟论述“秦既取蜀，……又取黔中，则断楚人之右臂，而楚之势孤矣。劫质怀王，操纵予夺，无不如意，于是灭六雄而一天下，岂偶然哉，由得蜀故也。”<sup>⑧</sup> 其三，灭蜀不仅使秦的疆域延伸至辽阔的西南地域，使之成为秦的后院，同时在灭巴蜀到统一六国的一百多年中，也使秦大量兼容和吸纳了西南夷地域的民族、文化因素，大幅度提升了秦在民族和文化构成上的多样性与复合性。

三、秦虽地处西陲，却对六国采取兼容并包的开放之策，尤其体现于不遗余力招贤纳士、延揽人才上。

在秦王政统一六国前，曾发生一件耐人寻味的事。事情的起因是“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sup>⑨</sup>

于是秦王政下达“逐客令”，驱逐所有外来谋士宾客。后来成为秦之丞相的李斯因系楚人，亦在驱逐之列。李斯在被驱逐途中，给秦王政上书，上书很长，大意是说，秦能有今日之霸业，全赖于秦之先王的兼容并包。

李斯的上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彊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sup>⑩</sup>

秦王政在读了李斯的上书后，收回了“逐客令”，并派人追回了已在驱逐途中的李斯。

从李斯的上书看，秦在崛起过程中，采取了虚怀若谷、兼收并蓄的政策，广泛吸纳六国士人

①《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页。

②刘逵注左思《蜀都赋》引《地理志》：“蜀守李冰凿离堆，穿两江，为人开田，百姓殫其利。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参见周勋初编选《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③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百四十四卢求《成都记·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701页。

④《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284页。

⑤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8页。

⑥《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3页。

⑦《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3页。

⑧郭允蹈《蜀鉴》卷一《秦人自蜀伐楚》，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23~24页。

⑨《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41页。

⑩《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45页。

并予以重用。如李斯在上书中所言:

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彊，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彊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sup>①</sup>

这段记载说，在秦的崛起过程中，穆公、孝公、惠王和昭王四个时期最重要。穆公“遂霸西戎”是因为重用了西戎的由余、虞的百里奚、宋的蹇叔、晋的丕豹、公孙支等五人；孝公重用卫国人商鞅，使“国以富彊”；惠王“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是用魏人张仪之计；昭王重用魏人范雎，则“使秦成帝业”。也就是说，秦一是向西开疆拓土，向西北“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并吸纳大量戎人成分，向西南则将富饶、辽阔的巴蜀之地收入囊中获取大量财富并与西南夷人群发生密切关系；二是招贤纳士，广泛延揽六国士人并予以重用，历任宰相中不少是六国之士人。在东、西两个方向的兼容并包，正是秦不断崛起和强大的重要原因。

楚的情况与秦颇相类似。《史记》也记楚的先祖“或在中国，或在蛮夷”。<sup>②</sup>楚是在征服和融合大量南方诸蛮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楚的先王熊渠也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楚以“蛮夷”自称，在以下一段记载中很典型:

三十五年，楚伐随。是也。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sup>③</sup>

正因为楚以“蛮夷”自居，楚庄王八年，楚伐浑戎，兵至洛，观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遂有楚王态度轻慢地问周室传国之鼎大小轻重之事:

楚王问鼎小大轻重，对曰“在德不在鼎。”庄王曰“子无阻九鼎！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王孙满曰“呜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桀有乱德，鼎迁于殷，载祀六百。殷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昔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王乃归。<sup>④</sup>

这便是“问鼎中原”的故事。至今在荆楚之地武汉一带民间尚流传一口头语，把“不服”叫做“不服周”，正是久远历史传统的子遗。

直到楚的势力逐步强大，周王室始对楚另眼相看“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楚）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sup>⑤</sup>

此记载透露出，在周王室眼中，楚的身份较为另类。从赋予“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的使命与责任看，楚与蛮夷关系密切，不仅处“蛮夷”之地，自身也混杂有大量蛮夷成分。

### 三

那么，秦、楚两国大量吸纳与融合“戎狄”“蛮夷”成分，同他们在战国向秦汉的历史变革

①《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41~2542页。

②《史记》卷四十《楚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690页。

③《史记》卷四十《楚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695页。

④《史记》卷四十《楚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00页。

⑤《史记》卷四十《楚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696~1697页。

中担负特殊角色和所发挥重要作用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战国七雄角逐的主要方式是战争。在战争中，强力、勇猛乃是决定性因素。秦因地近西戎，吸纳“戎狄”成分较多，在体质与性格上的异质性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决定了秦人的残忍远在六国之上。秦的军队被称作“虎狼之师”，士卒体格强健，能吃苦耐劳，坚韧顽强。秦军在征服六国过程中的强力与残忍，亦为六国所难以匹敌。即贾谊《过秦论》所言“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sup>①</sup>

商鞅以严刑峻法为特点的变法能在秦取得成效，除秦孝公大力支持外，也和秦与“西戎”的融合度高，其民性憨直、残忍而又守信等文化特点密切相关。秦能统一六国，固然有“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易守难攻和“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sup>②</sup>等多种因素相关，但最重要的却是人的因素，与秦“在西戎”，并大量吸纳“西戎”等成分致民族融合度高而具有六国所不具备之异质性优势有更为直接的关系。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继秦之后，在秦汉历史转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恰恰是战国七雄中几被视作“蛮夷”的楚。楚是“亡秦”主导，乃是不争的事实。率先起事反秦的陈胜、吴广均为楚人，其所率戍卒有相当一部分也是楚民，起事后也立刻趋据楚之旧都陈（今河南淮阳），并称“张楚”（含义是“张大楚国”，亦有“大楚”之意）。田余庆先生指出“张楚名号，可与‘亡秦必楚’之说照应。”<sup>③</sup>继陈胜、吴广之后的倒秦代表人物项伯、项羽皆楚人。在反秦过程中，他们立据称是楚怀王之后的熊心为义帝，以作为天下反秦的旗帜和象征。总之，秦是在以楚为主导、为旗帜的反抗中走向灭亡的。刘邦在反秦中崛起，灭秦后也是被西楚霸王分封于汉中，后逐渐坐大并在楚、汉之争中胜出。《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清楚表明，秦—汉并非直接连接，而是经历了秦—楚—汉的递变。<sup>④</sup>班固《汉书》虽开始淡化楚在秦、汉之间承先启后的作用，但在秦、汉承续与历史转折中，楚起了关键性作用乃毋庸置疑。<sup>⑤</sup>

那么，问题是，在被秦所灭六国中，为何不是由其他某一国，而恰恰是楚在秦汉转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个问题可能较为复杂，不排除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在纷繁的历史头绪中，有一点十分清晰——楚是在征服、融合南方诸多蛮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混杂大量蛮夷成分，这是楚最重要的特点。这直接造成楚地民风剽悍、楚人倔强且不怕事的特点。《诗经·小雅·采芣》：“蠢尔蛮荆，大邦为雠。……征伐獯豸，蛮荆来威。”<sup>⑥</sup>《释名·释州国》：“楚，……其地蛮多，而人性急，数有战争。相争相害，辛楚之祸也。”<sup>⑦</sup>这些记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楚的这些特点。“问鼎中原”“不服周”以及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的义气之举，均体现了这一特点。这可能正是我们理解“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关键所在。

对于秦、楚在战国至秦汉历史转折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范文澜、蔡美彪等在所著《中国通史》中明确指出“楚国八百余年扩张经营，为秦汉创立伟大封建帝国准备了重要条件，七国中秦楚应是对历史贡献最大的两个国家。”<sup>⑧</sup>

## 四

秦、楚在战国至秦汉的历史转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是一个显著的历史事实。但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一历史事实，我们从中能看到和汲取什么？却是更为关键。

翁独健曾从中国民族史角度作过如下阐释：

① 贾谊《过秦论》，萧统编《昭明文选（下）》，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609页。

② 贾谊《过秦论》，萧统编《昭明文选（下）》，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608页。

③ 田余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

④ 参见《史记》卷十六《秦楚之际月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59~800页。

⑤ 参见田余庆《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

⑥ 刘毓庆，李蹊译注《诗经》（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47页。

⑦ 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卷二《释州国》，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1页。

⑧ 范文澜，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7~199页。

总的说来,在战国七雄齐、楚、燕、赵、韩、魏、秦中,秦和楚对历史的贡献最多。对少数民族的影响也最大。最后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这是一个从分散逐步走向集中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戎狄蛮夷接受了华夏文化,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同时华夏文化也吸收了兄弟民族的许多创造和成就。<sup>①</sup>

颇具见识的史学家朱维铮先生也曾一针见血指出:

秦汉统一,相继以非华夏族的秦人、楚人为主,实即创建夷夏由混合到同化的新传统。<sup>②</sup>

这些论述,揭示了一个重要“谜底”——在中国历史发生转折的战国至秦汉之际,对于新的民族因素的吸纳和兼容并包乃至为关键。所谓“民族因素”,对当时“华夏”而言乃是一种异质性因素。而对异质性的吸纳和兼容并包,正是能否形成“新传统”并开拓新局面的关键。从此意义上说,是否持开放态度,是否对异质性的吸纳和兼容并包也正是决定中国历史走势的关键性因素。相较于齐、燕、赵、韩、魏五国,秦、楚两国之所以能在重大历史转折中发挥关键作用、担负起重要使命,正在于他们对异质性的兼容并包,从而形成“新传统”。陈寅恪先生在谈到盛唐气象时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sup>③</sup>从很大程度上说,对异质性“精悍之血”即新民族成分的充分吸纳和兼容并包,正是秦、楚能在战国至秦汉迷茫的乱世中“创空前之世局”的重要原因。

《国语·郑语》有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sup>④</sup>“同则不继”一语意味深长。什么叫“同则不继”?曾听生物学家说过一个词,叫“绿色沙漠”。意思是说,一片草原或一片森林,如果品种非常单一,则其生命力会大幅度下降,一旦遭遇某种自然灾害,如受到别的物种侵袭或是遭遇某一种病虫害,即可能大幅度退化,造成灭顶之灾。这样的草原和森林,看似郁郁葱葱,实则生命力脆弱,无法抵御外部的侵袭和灾害。这就是“绿色沙漠”。在内蒙古草原考察时曾学到一个知识,当地牧民判定一片草场好坏,方法很简单,划一个圈,在草地上数圈内有多少种草的品种,草的品种越多,则草原的质量就越好,反之,草原质量就堪忧。这里所遵循的,正是“生物多样性”原则。古人云“独木不是春”,其“独木”的含义不是指一棵树,而是指一种树。言外之意是,万紫千红才会生机盎然,春天乃因万千气象而充满生机与活力。这所反映的同样是生物多样性原理。人类作为生物之一,自然脱离不了生物属性,故生物多样性同样广泛适用于人类社会。一个文化多样性的社会和民族,其稳定性和生命力同样会得到大幅度提升。“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应是古人在漫长岁月中观察自然与人文提炼出来的卓越智慧,所诠释的正是多样性、复杂性对于文化及社会的意义。也就是说,同质化往往难以为继,原因是同质化的不断叠加,只会增强单一性,而单一性增强会使事物的局限性、脆弱性不断递增,丧失自我更新、变化和形成“新传统”的可能性和动力,渐趋积弱不振。对这一点,钱穆先生曾有一段精辟论述:

秦、楚则自始即以蛮夷见于诸夏。春秋时期群目楚人为蛮夷,以楚主武力兼并最烈,与诸夏宗法封建势力根本相冲突也。……齐、晋则以武力维持当时宗法封建国家之传统地位。楚、秦则代表相反对之一种势力也。诸国中受封建传统文化束缚愈深者,其改进愈难,故鲁、卫遂至积弱不振。其受封建传统文化束缚较浅者,其改进较易,……秦、楚则以受封建传统文化之熏陶更浅。<sup>⑤</sup>

这是对“同则不继”道理的深刻阐释。所以,要跳出“同则不继”的窠穴,唯有兼容并包,不断吸纳新的异质性因素,方能形成“新传统”,产生新的生命力。唯其如此,才会具有开拓历

①翁独健 《论中国民族史》,《民族研究》1984年第4期。

②朱维铮 《历史和中国历史》,载朱维铮《朱维铮学术讲演录》,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16页。

③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03页。

④左丘明 《国语》卷十六《郑语》,鲍思陶点校,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253页。

⑤钱穆 《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74~75页。

史新篇、“创空前之世局”之能力。“和实生物”的“和”，其内涵正是和而不同、兼容并包。这意味着，兼容并包即对异质性因素的接纳与兼容，乃是开拓新世局的根本。一个文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个人，无不如此。这正是秦、楚在战国至秦汉历史转折中发挥关键作用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 Inclusiveness: A Key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story

——Inspiration from the Trend of Chinese History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Qin Han Dynasties

SHI Shuo

**Abstract:**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ere a crossroad in Chinese history. What happened afterwards shows that unification was the only way to drag China out of the chaos brought about by endless wars. the unification also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move forward. Of all the seven powerful states that vied with each other for domination , it was Qin and Chu that finally achieved the unification. Why? Because compared with other five states , Qin and Chu had one thing in common: a geographic remotenes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area and a geographic vicinity to minority races like Rongdi and Manyi , which enabled them to absorb a lot of the “barbarian” cultural elements into their own culture. Such cultural heterogeneity may have in a sense blurred or marginalized their “Huaxia” ( Chinese) identity , but it also allowed them to have the possibility and power to create “something new”. just as an old Chinese saying goes ,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different things give vitality to all beings , while sameness can never last”. the absorption and inclusion of “barbarian” elements into the Qin and Chu culture not only enabled them to achieve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respectively , and expand the implication and territorial scope of “Huaxia” ( China) , but also made inclusiveness a key factor that determines the trend of Chinese history.

**Keywords:**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Qin Han Dynasties , Qin , Han , Xirong , ationManyi

( 责任编辑 张振伟)